

中国古代歌谣

整理与研究

王娟 编著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歌谣整理与研究 / 王娟编.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04-037967-9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民间歌谣—古籍整理—中国②民间歌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I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3094 号

中国古代歌谣整理与研究

Zhongguo Gudai Geyao Zhengli yu Yanjiu

策划编辑 王丽
责任编辑 王丽
书籍设计 张志奇
责任校对 陈杨
责任印制 朱学忠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16
印张 51.5
字数 1200 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版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
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37967-00

郑重声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未经许可的复制、销售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行为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避免读者误用盗版书造成不良后果，我社将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厉打击。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侵权行为，希望及时举报，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反盗版举报电话 (010) 58581897 58582371 58581879
反盗版举报传真 (010) 82086060
反盗版举报邮箱 dd@hep.com.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法务部
邮政编码 100120

ISBN 978-7-04-037967-9



定价 258.00 元

春风动春心，流目瞩山林。

山林多奇采，阳鸟吐清音。

暑盛静无风，夏云薄暮起。

携手密叶下，浮瓜沉朱李。

秋夜入窗里，罗帐起飘扬。

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

适见三阳日，寒蝉已复鸣。

感时为欢叹，白发绿鬓生。

中华文明古国，歌谣奕世传流。采风木铎，询之老成；使者省俗，观乎里巷。于口头民俗中蔚为大宗。老友王娟女史供职北大中文系，受任编纂《中华大典·民俗典》，经历岁年。出其余绪，著为此书。部厥纷繁，釐其先后；釀花成蜜，集腋为裘。前列知交老一辈民俗学家段宝林教授长序，后接女史自作序言并范文一首，考订源流，区明法式，已属言无剩义。堪称文辞精要，意思深长；纓组简编，肴覈文史；文心沉雅，标旨渊通。媵以诸及门论文多首，挺秀学林，植根茂苑；更昭美备，益焕光华。以化文曾从问事，索我片言。珠玉盈前，惭惶无已。惟存敬佩，仅可扬休。略缀俚辞，敷陈末简。时维癸巳桐月中浣，友谊颐和退士白化文谨述小引，以为前茅。

民间歌谣是最古老的民间创作。它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同庚。沈约说：“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宋书·谢灵运传论》）这是说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民间歌谣。英国大诗人雪莱也说过：“自有人类即有诗！”（《诗辩》）孔颖达说得更早。他在《毛诗正义》的序中说：“诗理之先，同夫开辟。”就是说，在盘古开天辟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民间歌谣——最早的诗。当然，盘古也是人。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歌谣。这是很有道理的。我在《中国民间文艺学》中论述文艺的起源问题时，就明确地说过：歌谣是人类最早的艺术，它是人类感情最直接的表现。因为歌谣的创作连任何工具都不要，所以比岩画等等造型艺术都要早得多，而学者们讲文艺的起源时，往往都是只讲造型艺术而不讲歌谣，这是不科学的。（参见段宝林等著《中国民间文艺学》7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歌谣不仅是最古老的文艺作品，而且其数量也是最多的。不管是不是识字，亿万人民大众随时都可以创作歌谣，张口就来，在口头流传。还有什么艺术作品的数量能够比它多呢？

因为歌谣是口头创作、口头流传，所以很不容易保存，大多像风一样消失了。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出于各种目的，被文人记录了下来。这是一些被人们认为重要的歌谣，它们是幸运的。

几千年来，在中国汗牛充栋的大量古书里，保存了许许多多的歌谣作品。其数量简直难以数计。中国的古书是世界上最多的，记录下来的中国古代歌谣也是全世界最多的。

过去，一些重视民间文学的文人对古代歌谣，进行过一些搜集和整理。最著名的是孔子所编的《诗经·国风》（周代的十五国风民歌），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上古尧舜至唐代民歌和文人的仿作民歌体诗），清代杜文澜、刘熙载编的《古谣谚》（上古至清代的民谣和谚语总集）等等。这三部作品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民间歌谣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但是，由于种种局限，这些古人所做的可贵的搜集工作，仍然只是冰山一角。如果要了解中国古代歌谣的全面情况，还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后来又有人做了许多专题的搜集和研究。如沈德潜的《古诗源》，任半塘的《敦煌曲校录》、《唐声诗》，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级瞿秋白文学会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合编的《中国歌谣资料》（第一卷：古代歌谣资料），赵景深、车锡轮编的《中国古代儿歌资料》，程英编的《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歌谣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的《中国民歌选》（上册），张声震主编的《壮族民歌古籍集成》，黄顺玉的《〈易经〉古歌考释》，朱自清的《中国歌谣》，天鹰（姜彬）

注：在此篇序言中，段宝林先生对研究部分的个别论文提出了修改意见，论文作者据段宝林先生的意见做了修正，编者因此对此篇序言稍做了删改。

的《中国古代歌谣研究》，钟敬文编辑的《歌谣论集》，胡怀琛的《中国民歌研究》，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王运熙的《六朝乐府与民歌》，张紫晨的《歌谣小史》，林河的《〈九歌〉与湘沅民俗》，徐华龙的《国风与民俗研究》，法国格拉耐的《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谢贵安的《中国谶谣文化研究》，雷群明，王龙梯的《中国古代童谣赏析》，徐华的《赤裸的性灵——中国古代民歌民谣》，尚恒元、彭善俊编的《二十五史谣谚通检》，周中明、吴小林等主编的《中国历代民歌鉴赏辞典》，马斗全等主编的《中国古代民歌鉴赏辞典》等等。虽然如此，可谓丰富了，但是，同整个的民间古代歌谣相比，仍然是很不全面的。

为了全面地对中国古代歌谣做总体研究，王娟同志下了很大工夫，在完成了《中华大典：口头民俗》卷、《中国民间歌谣集成》的数据库建设等等巨大的歌谣文化工程之后，又花了几年时间，从几百种古书中，穷搜博取，编出来这么一本大书——《中国古代歌谣整理与研究》。这是一本具有集大成性质的大书，对于歌谣研究，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在编选的科学性上，这是前无古人的。本书从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点出发，对歌谣作品进行了科学的立体描写：不仅尽可能地把歌谣的创作目的、社会功能、生态环境、有关民俗活动等等情况的资料作了记述；而且还尽可能地把所有的不同异文，都罗列了出来。

过去由于对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点缺少认识，一般的编选者往往只选其中的一首他们认为是最好的，而略去了其余的所有异文。这是用对待作家文学的办法来对待民间文学了，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民间文学在民间流传时，因时间、地点、民族、国家的不同，其内容和形式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在各个时代或各个地方形成了许许多多的不同异文。每一种异文，只是此作品的一个侧面，所有异文的总和才是此作品的整体。因此，只有把所有的异文，全部搜集起来，我们才能够厘清此歌谣的来龙去脉、创作和演变的过程，它的全部内容和艺术形式，它的社会功能、作用以及对文人的影响等等情况。

书中对我们熟悉的许多歌谣名作，都同时或在不同的地方，罗列了不同的异文，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因为这是前人的歌谣集中见不到或极少见的。例如：春秋时代晋国的《龙蛇歌》就罗列了七八种异文，其记载详略各异，甚至此歌的作者也有不同的说法。《吕氏春秋·季冬篇》：“晋文公返国，介子推不肯受赏，自为赋诗云：有龙于飞……”这是说这首《龙蛇歌》是介子推自己做的。但是其他好几种异文都是说，是他的“从者”所做。如汉代《史记·晋世家》和刘向《说苑》卷六都说：“赏不及推，介子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或曰：“有龙矫矫……”六七个异文，都是如此说，大同小异，值得研究。究竟是介子推自己做的，还是他的随从贴的大字报？我看似乎他自己是不会做的，还是别人为他抱不平而做的吧。不过，也不一定。不同的记录，我

们都应该了解，这是研究工作的需要。可惜，过去的歌谣集的编者，往往对此不理解而略去了许多异文。此外，像《杞梁妻（孟姜女）歌》、《东门行》、《陌上桑》、《饭牛歌》、《修秦王陵歌》、《蜡词》、《击壤歌》、《月子弯弯照九州》、《张打铁》、《看见她》、《小白菜》等等许多重要的歌谣作品，书中都尽可能搜集了几乎是全部的异文，对于全面了解歌谣的内容和形式、它的创作流传情况等等都非常有用。所以此书在这一方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歌谣是民俗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歌谣又是诗，是一种口头文学，也属于艺术范围。所以对歌谣的研究，从五四开始，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发刊词就明确了两种角度：文艺的和民俗的。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是有人把二者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了。只搞民俗研究，而否定从文艺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说：“民间文学是民族无意识的文化产品。不能当成文学作品来分析什么思想性、艺术性！”我曾经在文艺报写文章对这种“新观念”进行过批评。可是，最近忽然发现此人又180度大转弯，以权威的架势，大言否定了民俗角度的研究，只主张进行文艺角度的研究。这就说明，有些人，包括一些“专家”，在民俗角度和文艺角度的关系上，往往三番四倒，忽东忽西，所以还需要提高认识。

其实，这两种角度的研究是完全可以兼容并包的。因为歌谣等民间文学作品，本来就是一种民俗的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一种口头文学作品。不过它同文人的“纯文学”并不同，它不是纯文学，而是一种立体的文学——实用文学，既是文学，也是民俗，是多面的、立体的。

我们在民间文学本体论的研究中，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立体性的范畴概念，现在已经得到大多数民间文学家的认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陈劲臻教授甚至专门写了两篇长文，来分析立体性理论的创新；但是仍然有个别所谓“现代中国民间文艺学史”的权威，对此不屑一顾，却又不能在理论上进行反对。这是不正常的。鸵鸟政策并不能否定真理。只有实践才能检验真理。如今这本歌谣学的科学巨作，又一次充分证明了民间文学立体性的存在。而否定它，把民间文学的民俗性和文艺性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并且已经在民间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中造成了许多危害。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好好记取。我想，这一点也是这部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吧。

歌谣的内容极其丰富，过去有过许许多多不同的分类方法。朱自清的《中国歌谣》曾经对《歌谣》周刊上提出的许许多多不同的分类法做过全面的研究。王娟同志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古代歌谣现存资料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新的分类，把古代歌谣分为八类：

神话传说歌谣 故事歌谣 时政歌谣 谏言歌谣 仪式歌谣 抒情歌谣
风俗歌谣 儿歌童谣

这种分类就是按照文学的和民俗的两个方面进行的。从文学、艺术学、民俗学乃至人类学、文化学、非遗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

等等学科各种角度的研究者，都可以从中比较容易地找到自己需要的材料。

民间文学的作品是人民集体口头创作，例如歌谣，对其作者、时代、历史等等情况的判断，是非常困难的。一些作品是无名氏创作的，一般可以算是民间创作；不过它也可能是文人创作的。而不少作品往往就是伪托某某文人创作的，但是事实上有时并非如此。所以我们难以确定。现在书中把它都收集齐全，我以为这种做法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对研究和欣赏都有利，可以免除遗珠之憾。

民间文学作品的时代，因其流传久远，而非常难以判断。其创作时间，可以从它反映的事情发生的时代算，但是它也可能是后来创作的。也可以从作品被记录的时代算，但是，这很可能并不是它创作的时代，也可能已经流传很长时间了。现在此书以记载歌谣的文献的时代先后为序来排列，是比较稳妥的办法，可是，这将会把反映同一个事情的不同作品，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这就对研究和欣赏造成了不便。最好弄一个名目索引、人名索引，就可以较全面地看到反映这一事件、这一人物的歌谣究竟有多少，对研究和欣赏有利。

歌谣研究是“文艺民俗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已出版了三部文艺民俗学的书。陈勤建的一本《文艺民俗学》是从民俗（包括民间文学）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和作用方面进行研究的，这是立足于文艺学的研究；还有宋德胤、秦耕的两本《文艺民俗学》，都是研究文艺作品中的民俗的，以文艺作品中的民俗描写作为资料来研究民俗学，是立足于民俗学的研究。我以为这两个方面应该集合起来，成为文艺民俗学的两翼。

民俗对文艺创作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作为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的会长，曾经研究过现当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流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文艺研究》上发表过部分成果。我发现从鲁迅、沈从文、赵树理、孙犁、刘绍棠、贾平凹、冯骥才、古华、莫言等等乡土文学大家的创作，可以看到以描写民俗为主要特征的乡土文学流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成就最高的一个流派，其他所有别的流派，都远远不能望其项背。在外国文学中，情况也大致如此。在研究民间文学（也就是口头民俗艺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时，我又发现所有重要的文艺体裁——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词、曲、话本小说、杂剧戏曲等，都是首先由民间文学创造出来的；所有的大作家都是认真学习过民间文学的；民间文学的优秀作品如《国风》、《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都是文学史上的典范之作；这些已经构成一个艺术规律——雅俗结合律。（参见《光明日报》1987年12月15日）在进行歌谣研究时，情况当然也是一样的。这就说明，我们的研究任务还是很重很重的。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本书的序言和第二部分，有几篇对歌谣的研究文章，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很有启发性。

王娟同志的序言对歌谣中各种不同的体裁，除民歌与民谣之外，又提出了一种“诵”的体裁，引用了大量的材料做了很好的论证，这是对中国文学史上文

学体裁的一个新的开拓。这种勇于思考的创新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当然，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一下，诵为什么后来消失不用了，它与谣是什么关系。我以为诵和谣的形式和内涵，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只说不唱并有讽刺意味的顺口溜，所以后来就由谣把诵取代了，吃掉了，或者说包容了。

这里有一个对谣的认识问题，一般古人都根据毛诗的解释，说“徒歌曰谣”，认为谣是歌的一种，是徒歌——没有乐器伴奏的民歌。如果我们到民间看看歌谣的流传情况，就会发现，在一般情况下，在劳动中、走路时，人们唱歌是绝对不可能有什么乐器伴奏的。何况会演奏乐器的只是极少数的人。所以说“民歌都是有乐器伴奏的”，这种说法明显地是不对的，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民歌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没有乐器伴奏的。这就是说，民歌绝大多数都是徒歌，难道可以说：民歌绝大多数都是民谣吗？

《韩诗章句》说：“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这里的“章曲”就是指的歌唱的曲调，所以它的意思应该是：“唱的是歌，只说不唱的顺口溜是谣。”从历史上和现当代的民歌和民谣流传情况下二者区分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样划分是符合事实的。事实说明：把章曲理解为伴奏是不对的，章曲是指的歌唱曲调，而不是乐器伴奏。关于这个问题，天鹰（姜彬）同志在《中国古代歌谣研究》中做过很好的论证，我们的民间文学教材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定义来区别歌与谣的。这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共识。

冯晋的《庭院深深——从中国诗歌中探寻建筑空间的诗意》一文，从诗经国风中的一首民歌《著》（今译《门屏之间》）中的三段描写来研究建筑民俗文化，由这首民歌中描写的大门、屏风、庭院和堂屋的设置，用许许多多的有关历史材料，仔细研究中国四合院的建筑空间两千年来的发展过程，写得非常有意思，是一篇文艺民俗学的力作。

范雯的《北京大学歌谣运动与歌谣搜集、整理与出版》一文，具体而详细地把北大征集歌谣的前前后后整个的情况，都做了很科学的立体记述与分析，条分缕析，非常清楚明确，比一些简单化的民间文学学术史的著作要有用得多。比如，中国近代第一部北京歌谣集，是什么出版社出版的呢，北大《歌谣》周刊是如何征集歌谣的呢，文中根据大量的事实材料，说明“从民俗的、学术的角度出发，就搜集和整理歌谣的标准进行过许多讨论，并达成了某些共识性准则”。这就是1. 周遍；2. 求真；3. 分类。并且大多进行“家乡的歌谣搜集”。关于歌谣研究的目的，除了文艺的和学术的目的之外，还有一个“教育的”目的，这是作者更加全面的概括。这些论述绝不抽象空泛，都有大量的事实根据来支撑。文章最后一部分是对当时出版的三部重要的歌谣研究集——台静农的《淮南民歌集》、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刘经庵的《歌谣与妇女》，一本本地进行详细论述，对每一本书的来龙去脉、有关的讨论、内容的分析，都具体而微。文后还附录了《1949年以前歌谣搜集和出版情况》，包括“刊登歌谣及歌谣研究的报刊”、“外

国人所搜集的中国歌谣”、“歌谣专集或选集”和“人类学调查报告”等等。所以我认为：这是一部超过前人的很好的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新的研究成果，对五四时期，中国歌谣学运动做了全面而具体的总结，很有新意。

李昕桐的《儿童的想象——中国古代童谣的意义赋予》一文，对古代童谣的意义进行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首先把古代的童谣观作了梳理，一是“预言及政治预兆”，通过对《二十五史谣谚通检》中的童谣作品统计，发现“政治预言性的在史书中占了绝大部分”；二是“风俗仪式与游戏”，宋代以后的笔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中记录较多；三是“教育蒙养之实用”，如明代《小儿语》、《续小儿语》等等是为儿童教育而收集的；四是“童心天籁的想象”，清代《天籁集》、《广天籁集》明确这是为儿童本身的童趣、童心而收集的。在“对童谣的解释”一节中，对谶纬童谣与五行灾异说的关系，做了论证。特别是对诗妖和荧惑星的说法做了历史的梳理；最后“从童谣到儿歌”，认为古代的童谣观重在政治预言，而近代以来提出“儿歌”一词，则重在教育，这是重视通过游戏进行儿童教育的历史进步。此文的写作是有不少新的发现和论证的，值得我们重视。

任滨雁的《歌谣的研究》从北大的歌谣运动与西方民俗学的关系入手，谈到研究方法问题，几十年的歌谣研究历史全部囊括其中，尽管很难深入，但文章搜集了大量材料，论述还是有价值的。

对于民间诗律研究的价值，受到了学术大师季羨林、李赋宁、王力、周祖谟、吴小如和诗人冯至、臧克家、公刘、贺敬之以及许多民间文艺学家的高度评价。这三部重要的著作的研究，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创举。

任滨雁的《〈古谣谚〉初探》对《古谣谚》的作者、编辑特点和内容分类等等，做了详细的介绍，资料比较丰富。特别是对历代谣谚的搜集与辑录的历史，从先秦到清代，做了很好的梳理。

关于歌、谣、谚语的划分，我们现在早已弄清，在《中国民间文学概要》（1981.1.第1版—2009年第4版）等教材中，有详细的论证。这就是说：歌是唱的，谣是说的，谚语是哲理性、科学性的短谣。谣谚都是说的，所以与歌不同，不可混为一谈，这已经成为民间文艺学的一个常识。

朱倩的《冯梦龙〈挂枝儿〉与〈山歌〉》，是一篇全面论述介绍冯梦龙的两本民歌编著的论文。时代背景和冯梦龙的生平两节，分析介绍比较全面具体；“书籍概要”分别详细地介绍了两书的名称、出版情况和编辑体例；“俗曲民歌的来源”一节则根据冯梦龙的评注把书中的歌谣俗曲的来源路分为田野采风、市井艺妓和文人拟作三个方面。“批注特色”是很有特色的。作者以专业眼光指出，冯梦龙注意民歌异文的搜集和记录、有的还标明出处、评点内容，有时也“借题发挥”。这些都有例证，不说空话。

最后一篇是王娟的《游戏童谣“牵郎郎”释说》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以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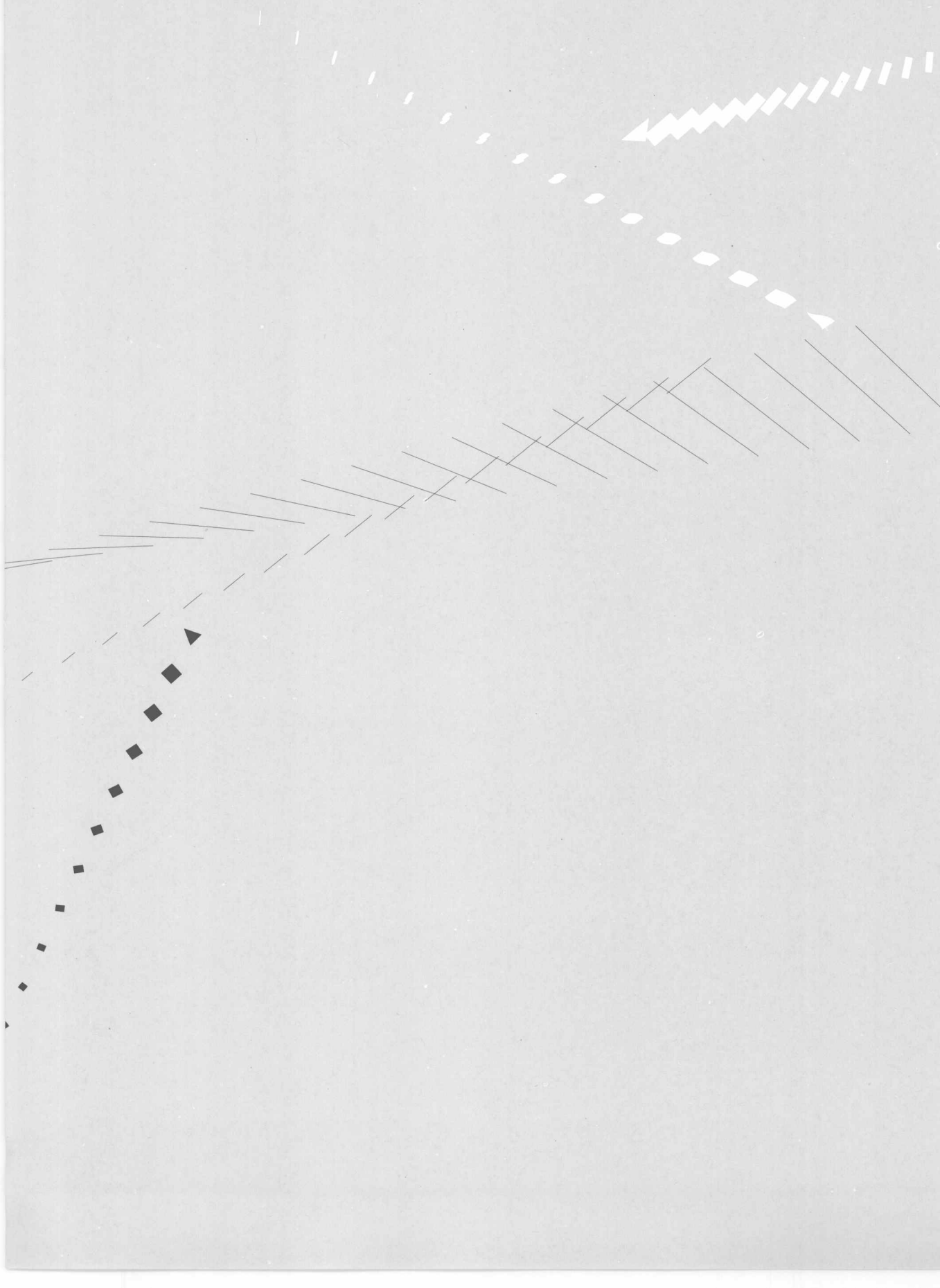
篇童谣为例，引用了许许多多的例证，分析它的立体性特征，说明古人如何看待与解释童谣的微言大义，很有说服力。“牵郎郎”是一个立体的儿童游戏，孩子们一个牵着一个的后衣襟，口念童谣：“牵郎郎，拽弟弟，踏碎瓦儿不着地。”明清学者陈沂、褚人获等人根据这个游戏和童谣的内容，认为这是祈求生男孩、不生女孩的歌谣。这是一种巫术歌谣，梁绍壬认为这首童谣与《诗经·小雅·斯干》的思想内容是相似的。《斯干》说“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后代学者一般认为生男弄璋、生女弄瓦，这是重男轻女的证明。作者认为从这首诗的内容来看，只是说明生男、生女民俗礼仪的不同，“弄璋”和“弄瓦”只是男孩与女孩的代名词，“没有表现出男尊女卑的倾向”。这是一个新的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正如文章的结尾所说：“童谣往往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我们解读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这也可以作为本书的结语。

总之，《中国古代歌谣——整理与研究》是一部歌谣研究的很好的著作。从规模和科学性上看，它对古代歌谣的搜集和整理是史无前例的，这是从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专业角度、用专业的科学方法对古代歌谣资料的一次新的整理与研究，带有一定的总结性。尽管在资料上和研究上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那是新生事物不可避免的局限，在今后的研究中将会不断地深入和完善，这是必然的，我相信。歌谣研究是如此重要，而研究却相对不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在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今天，我们举双手欢迎这部新的研究成果胜利出版。

段宝林

2013年8月8日于北大

前言



歌谣的历史悠久，其源头可以上溯至人类文化的早期阶段，如宋王灼所言：“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之所起也。”¹关于歌谣的起源，清人刘毓崧说：“风雅之述志，著于文字；而谣谚之述志，发于语言。语言在文字之先，故点画不先于声音，简札不先于应对。”²近代学者朱自清也认为：“歌谣起于文字之先，全靠口耳相传，心心相印，一代一代地保存着。”³台静农也曾说过：“人类语言形成的时候，即歌谣发生的时候，而且歌谣的产生必然先于文字。”⁴因此我们说，在文字出现之前，歌谣就已经发生，并且以口耳相传的方式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很难考证歌谣的发生、发展，因为歌谣的产生和发展超出了人类文字历史的范畴，而且，在人类开始使用文字记录历史和文化的时候，作为一种口头表达形式，歌谣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已经相当完备了。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无疑是中国古代歌谣的集大成者，其中不仅包含了各种类型的歌谣，如抒情歌谣、仪式歌谣、故事歌谣、时政歌谣、史诗、风俗歌谣等，而且其艺术形式，无论是遣词造句、节奏韵律还是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也都达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高度。

歌谣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历朝历代对歌谣都非常重视，并将歌谣视为完善礼制、考察政治、体察民情、休养生息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更为突出的是歌谣甚至从上古时期开始，就被默认为是君民上下沟通的渠道，正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⁵。民众往往选择通过歌谣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愿，而不必担心招致责罚。官方则可以通过采集歌谣“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⁶。因此，古代歌谣首先便被赋予了“言情达意”的功能。从《虞书》的“诗言志”，到《礼记》的“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再到《诗大序》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人的歌谣观。实际上，“诗言志”的歌谣观一直贯穿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所谓“千古诗教之源，未有先于言志者矣”⁷。直到清代末年，清人刘毓崧在《古谣谚·序》中依然强调说：

诚以言为心声，而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达下情而宣上德，其关系寄托，与风雅表里相符。

尽管后世采诗观风的制度不再，但是，在仁人志士的眼中，歌谣始终具有“达下

1-（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2-（清）刘毓崧：《古谣谚·序》，中华书局1958年版。

3- 朱自清：《中国歌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4- 在《从〈杵歌〉说到歌谣的起源》一文中，台静农写道：“人类语言形成的时候，即歌谣发生的时候，故歌谣的产生应先于文字；例如有些野蛮民族，没有历史，没有文字，然而他们有歌谣，不过这种歌谣，是用语言传述的，不是用文字表现的。……足见原始人同文明时代的人所不同的是生活技术，而喜怒哀乐的情绪却没有分别。”见《歌谣》周刊第2卷，第16期，1936年9月19日。

5-《诗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

6-《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08页。

7-（清）刘毓崧：《古谣谚·序》，中华书局1958年版。

情而宣上德”的功能。

另外，歌谣还常被看作是政治的风向标，因此，人们往往仅从歌谣就可以为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或某一特定的朝代书写政治，作出评价，如《宋书·乐志》所载：“黄帝、帝尧之世，王化下洽，民乐无事，故因击壤之欢，庆云之瑞，民因以作哥（歌）。”宋陈旸也说：“一物不得其乐未足以为乐之至，一人不得其和未足以为和之至。舜之治功大成而以乐形容之，百兽至于率舞，则无一物之不得其乐者矣。”¹在古人看来，政治的成功必然反映在歌谣之中；反之，政治的失败，也可以透过歌谣见其端倪。陈旸曾对历代歌谣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论述，他认为：

声音之道，常与政相为流通，故政治而俗康，则其歌和以雅；政荒而下怨，则其歌哀以思。是以夏政之衰，官嫔万人衣以文绣，食以粱肉，鼓噪晨歌，闻者悲酸，见者忧思。商政之敝，造靡靡之乐，感北里之声，饮以长夜，人不堪命。迨周之末，鲁以淫乐废朝，晋以嗜音败国，战国苦兵，乐尤哀思。闻渐离之筑而沾襟，聆雍门之琴而潜涕。继之秦皇殫财于钟虞，汉武厌志于新声，王莽乐成而哀厉，顺帝闻禽而悲泣。为乐若此，其政可知矣。既而梁商兴薤露之歌，朝臣为之饮泪。梁冀妻为啼妆愁眉堕马之饰，京师为之争效，以至懊恼歌于晋，挽铎歌于宋，杨畔奏于齐，后庭奏于陈，爰及隋唐新音变曲，倾动当世。或写倾杯，行天之声；或歌世俗讴谣之曲，徒取悦心，志为耳目之娱而已，无复止乎礼义之意也，可不大哀邪²。

歌谣既然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官方和民间又都如此重视歌谣，那么，什么是歌谣？其内容和形式又如何呢？

早在两千多年前，歌、谣之称就已经出现，例如《诗经·魏风·园有桃》中就有“心之忧矣，我歌且谣”的诗句。可见至早在当时，歌和谣就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了。实际上，古代的“歌”和“谣”是相对而言的，即歌的定义通常是相对于谣而言的，谣也如此，概括起来，古代关于歌和谣的区分标准，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合乐、徒歌”说，一种是“雅歌、俗谣”说。另外，“歌”、“谣”之外，古代还有一种较少为人们所关注的文学体裁称为“诵”，其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均与歌、谣稍有不同。只有将歌、谣、诵一并讨论，我们才能对古代歌谣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1-（宋）陈旸：《乐书》卷八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宋）陈旸《乐书》卷一百六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一、合乐，徒歌

关于歌和谣的区分，古代较早也较为有名的是《毛诗故训传》中的“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韩诗章句》中的“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¹。“合乐”与“徒歌”首先成为区分歌和谣的标准，此后，许多学者延续了这种观点，如《尔雅·释乐》：“徒歌谓之谣。”汉许慎《说文解字》简称《说文》：“𪛗（即谣），徒歌，从言肉。”汉蔡邕《月令章句》：“乐声曰歌。”东汉刘熙《释名》：“人声曰歌。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质也。以声吟咏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叶也。故究冀言歌声如柯也。”²《艺文类聚》卷四十三引《说文》曰：“咏诗曰歌，独歌谓之谣。讴，齐歌也。”

这种把徒歌与合乐作为区分歌谣的关键所在的说法虽然取得了众多学者的一致认可，但在具体解释何为徒歌，何为合乐，以及歌谣所包括的内容和分类上，学者们的观点却不尽相同。朱自清认为，中国所谓歌谣的意义，向来极不确定，例如合乐与徒歌不分³，所以具体到实际的研究过程当中，歌和谣的界限并不十分的清楚。谈到合乐，古人的一种解释是有旋律，可以歌唱，而且还要有乐器（诸如琴瑟等）伴奏，才称为合乐。例如，《诗经·魏风·园有桃》有“我歌且谣”诗句，孔颖达曰：

《释乐》云：“徒歌谓之谣。”孙炎曰：“声消摇也。”此文歌谣相对，谣既徒歌，则歌不徒矣。故曰“曲合乐曰歌”，乐，即琴瑟。《行苇》传曰：“歌者，合于琴瑟也。”歌谣对文如此，散则歌为总名⁴。

《初学记》卷一五引《尔雅》曰：“声比于琴瑟曰歌，徒歌曰谣。亦谓之𪛗，谓无丝竹之类，独歌之。”⁵照此理解，如果“合乐”为乐器伴奏而唱的“歌”的话，那么“徒歌”的“谣”就可以看作是无乐器伴奏的歌唱，或者说清唱。如宋程大昌《演繁露》所言：“古谓徒歌曰谣，是其比也。其所谓徒者，但有歌声而无钟鼓以将也。”⁶明杨慎在其《丹铅余录》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尔雅》曰：“徒歌曰谣。”《说文》“谣”作“𪛗”⁷，注云“𪛗从肉言”，今按徒歌，谓不用丝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声也，出自胸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谣，以其言出自其胸臆，不由人教

1-《初学记》卷一五引《韩诗章句》，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6页。

2-（东汉）刘熙，（清）毕沅疏证，（清）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31页。

3-朱自清：《中国歌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4-《毛诗正义》卷九，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

5-《初学记》卷一五，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6页。

6-（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三，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5页。

7-《说文》无“谣”字，只有“𪛗”，《说文》释为“徒歌”。朱自清认为，𪛗，古“谣”字，今通作“谣”。参见朱自清《中国歌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